

一、“好语穿珠”求新学 ——林纾与书评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著名文学家,古文家,翻译家。他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坛上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1895年“公车上书”前,维新变法中,他是积极拥护者,是“先进的维新党”;辛亥革命前主张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思想变得保守。“五四”运动前后,反对新文化运动,十分守旧。他一直以前清遗老自居。每逢光绪死日,他必到陵前哭祭。他中过举人,没有做过官,教过书,一生中以写书、译书为生,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清介的文人。他是一位积极热情的爱国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迫,提倡保种自强。

林纾和严复是最早引进西方社会科学、文学的人物。严复1896年翻译评介了《天演论》,胡适称他是“西学第一者也”。林纾1897年翻译,1899年出版了《茶花女遗事》。这两本书在当时影响都很大。康有为曾写诗称赞:“译才并世有严林”。当年有人称他们是“翻译史上的开山祖师;不仅前无古

人而且就此刻（1935）看来，还是后无来者。’他们的翻译，各有不同的侧重点。“自严复开始翻译西洋近世思想的书，自林纾才开始翻译西洋近世文学的书”。当时有一位读者说：“司各得是我认识西洋文学的第一步；而它的介绍进来，其对于近世文化的意义，是决不下于《天演论》和《原富》的。’他们一个引进社会科学，一个引进文学，可称双璧，都是开启中国人认识西洋现代思想之门的关键人物。

林纾被人称为“译界之王”。《茶花女遗事》问世后，在国内影响极大。严复写诗赞美：“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周作人称其“笔墨腴润轻圆，如宋元人诗词”。有位作家则评称：“好语穿珠，哀感顽艳，读者但见马克之花魂，亚猛之泪渍，小仲马之文心，冷红生之笔意，一时都活，为之欲叹为观止。”林纾从翻译《茶花女遗事》的成功中受到极大的鼓舞，继而不断翻译，一发而不可收拾，直到他去世前，一直坚持不懈，几乎每日不断，十分勤奋。他一生翻译了171部外国小说，其中60多部是世界名著。有英、法、美、德、俄、印等十多个国家的作家，如大小仲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托尔斯泰、狄更斯、司各得、易卜生、伊索、福笛、雨果、哈葛得等几十位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社会、伦理、历史、军事、言情、侦探、冒险、神圣、滑稽、童话等。读者面非常宽，鲁迅、郭沫若、钱钟书、周作人都说曾受到他的翻译作品的影响，鲁迅、周作人的《域外小说集》就是受其影响而翻译的。

1924年林纾去世后，许多名人如郑振铎、钱钟书、周作人等都对他和他的翻译作品，进行了认真的评论。评论界认为，他翻译的外国作品对中国影响很大，首先是打破了中国章回体小说的传统体裁，创造了一种新的形式；第二，开阔了中国读者的眼界，认识了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家庭、人性、生活等等；第三，知道了西方也有小说，外国的作品可与中国太史公比

肩；第四，提高了小说的地位，翻译外国作品一时成为社会时尚；第五，认识了外国强盛之道，警醒中国人认识亡国灭种的危险。

林纾的翻译是很特殊的，他不懂外文，只能根据合作者念原文，经过他思索品味翻译成中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作品的选择，所以，不少二、三流作品，他也翻译了，这是他翻译中的一大遗憾。

林纾不仅是一个翻译家，他也是清末民初的书评家。他翻译西方小说时，了解了作品的全部内容，认真进行思索，在此基础上，对作品作了大量评论。他用短评、译后剩语、按语、序跋、小引、前言、识语、达旨、例言等形式，写成文章，放在作品前面，与作品同时发表。在他翻译的 171 部作品中，写书评的有《黑奴吁天录》、《鲁滨逊漂流记》、《块肉余生述》、《伊索寓言》等约 70 部，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在当时，除了严复，这样集中评论外国作品的，没有第二人。即使到现在为止，似乎也没有哪一位书评家集中评论过 70 多部外国作品。所以，他评论外国小说的功绩是很大的。其实，他不仅评了外国小说，对古代作品也有不少评论。对《古文辞类纂》、《刘宾客选集》、《震川选集》、《左孟庄骚精华录》、《中学国文读本》、《中华字典》等 20 多部作品都有所评论。而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则是对外国小说的评论，所以，这里只讲他对外国小说所作的书评。

林纾在书评中，十分肯定外国小说的感染力、教育力和对社会的影响力。这也是他一直坚持翻译外国小说的原因。他的朋友陈熙绩为他翻译的《歇洛克奇案开场》写序说：“畏庐先生夙以译述泰西小说，寓其改良社会，激劝人心之雅志，自茶花女出，人知男女用情之宜正，自黑奴吁天录出，人知贵贱等级之宜平，若战血余腥，则示人以军国之主义，若爱国二童子

示人以实业之当兴……一部有一部微旨，先生无浪费之笔墨耳。”他自己也是这样想这样做的。他认为小说可以灵活运用，于社会、于国家、于改良、于教育、于政治等方面都可以产生影响，发挥作用。西人小说不仅可以“寓以哲理”，还可“兼言政治得失，用讽其祖国”，“实力加以教育，则社会足以改良”。可惜中国没有狄更斯这样的人，“能举社会中积弊著为小说，用告当事，或庶几也”，俾政府知而改之。他在《〈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序〉》中说：“余非学西人也，其悯宗主国之蹙，独念小说一道，尚足感人，及既得此书，乃大悦，谓足以告吾国之父兄矣！”他反对学究对青年的影响，“委巷子弟为腐窳学究所遏抑，恒颠预终其身。而清俊者，转不得力于学究，而得力于小说。”他认为小说的作用大于迂腐学究的教育。他在《〈深谷美人序〉》中说：“余老矣，羁旅燕京十有四年，译外国史及小说，可九十六种，而小说为多。其中皆名人救世言，余稍微渲染，求合于中国之可行者。”他发自内心地说：“小说之功，宁不伟哉。”林纾一方面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主张维护旧制度，但他又积极翻译、评论具有新思想的西方小说，这是矛盾的。他翻译、评论小说，实际上是将新思想引进中国，客观上、间接地对新文化运动起到了推动的作用，这也许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林纾书评的重要特点是用文言写作。他十分推崇左、庄、班、马、韩、柳、欧阳、曾、归等古人的文章，认为他们是天下文章的归宿，应以他们为师。他对文言的运用非常恰当熟练。评论界说他“替古文开辟了一个新世界，替古文争取得最后的光荣”。他运用古文翻译近世文学，“替古文延长了二三十年的命运”。胡适评论说，古文里很少滑稽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狄更斯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等。古文的运用，自司马迁

以来 从来没有这样大的成绩。“《茶花女》的成绩 遂替古文开辟了一个新殖民地 ”,词暨娓娓 意亦深奇”。钱钟书则说:“林纾不是用古文译小说,而是用较通俗、较随便 富有弹性的文言 保留了若干‘古文’的成分 但比‘古文’自由得多 在用词句法上 规矩不严密 收容量很宽”。这是另一种看法。

林纾在书评中常常引用古文的内容,将之和所评作品类比,结合得很紧密,将所评作品的思想和中国的传统道德规范紧密相连,认为中西思想几出一辙。如在《双孝子喋血恩仇记》评语中说 双孝子与聂政‘不类而类’,吾读聂政传 吾益服从两孝子矣。司各得‘可侔吾国之史迁’哈葛得著《斐洲烟水愁城录》的写法就是史迁的写作法。林纾把《块肉余生述》、《孝女耐儿传》和《石头记》、《水浒》和 史班 相提并论,说外国小说‘处处均得古文义法’称赞《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有 7 妙 都合古文之意;传中事 往往于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 以为大类吾古文家言。”这样联系 虽然比较牵强,也表达了他对古文的情有独钟。林纾用古文译书,用古文评书,而且获得了成功,这是他很特殊的地方。

林纾的书评,和时代特点关系极大。中国当时受帝国主义的压迫 遭强国欺凌 国弱民穷。他极其悲愤 在作书评时,几乎都是在介绍原著内容并联系中国现实,抒发自己的感想,述说自己的政治主张。想促使中国人认识危机,要爱国,要保种自强,要向西方学习,要实业救国,同时也鼓吹君主立宪。这些书评多属政治性评论。

林纾的第一篇书评是 1901 年写的《〈黑奴吁天录 序〉、《〈黑奴吁天录 跋〉》。《黑奴吁天录》是美国女作家斯士活的小说,描写美国农场主虐待黑人以及黑人的悲惨生活,这部小说是反对奴隶制度的。林纾知道这本书后,和合译者“两人且泣且译,且译且泣”。原因是他想到中国被拐骗到外国的华人,

正遭到残酷压榨，甚至受到杀害。美国政府正“厉禁华工”，“捕逐驱斥”。他说，“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他悲叹：“黄种人受虐，或加甚于黑人，而国力既弱，为使者复馁慑，不敢与争”。他悲愤于清政府的无能，不敢为受压华工撑腰。他羡慕日本政府能保护在外国的日人：“若夫日本，亦同一黄种耳，美人以检役故，辱及其国之命妇，日人大忿，争之，又自立会与抗。勇哉日人也。若吾华有司，又焉知有自己国民无罪，为人囚辱而夷死耶？……国威之削，又何待言？”他想通过译出此书以“儆醒同胞，‘蠲弃故纸，勤求新学’，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

《〈爱国二童子传〉达旨》也是他的一篇有代表性的书评。写于1907年。书评除了介绍原著的内容外，更多的是感慨中国的现实，要中国青年认真学习、努力办实业，振兴国家。他认为中国“国力荏弱”，兵力不强；“强国者何恃？曰恃学。恃学生。恃学生之有志于国。尤恃学生人人之精实业。”他梦想以实业救国，并以印度和犹太人、英国人为例，以激励中国人：“如印度者，赖实业足以支柱也。”犹太之民，“多钱而善贾，竟吸取西人精髓。西人虽极鄙之，顾无如之何”。虽是“煨烬之余灰，恃其实业尚可幸存。”英国也是因发展实业，“始克自振”，成为了“天下霸王”。而中国在各国压迫之下，只有“讲究实业，潜心图存”；“人人各有国家二字载入脑中，则中兴尚或有冀”才有希望。但他仍念念不忘于“君主立宪”；“若立宪之政体，平民一有爱国之心，及能谋所以益国家者，即可立达于议院。”他对君主立宪想得十分美好。林纾把希望寄托在立宪上，他说：“变法何年，立宪何年？上天果相吾华，河清尚有可待。”可以说，立宪是他当时的最高政治理想。

林纾在书评中一再提倡学习西方。在《〈斐洲烟水愁城

录 序》中认为“欧人志在维新 非新不学 即区区小说之微，亦必从新世界中着想，斥去陈旧不言。若吾辈酸腐，嗜古如命 终身不安知有新理耶？”在《〈英孝子火山报仇录 序〉》中鼓励当权者要学西学“若秉政者斥西学 西学又焉能昌！”他希望通过学习西方，达到强国的目的。在《〈剑底鸳鸯 序〉》中他说“今日之中国 衰耗之中国也 恨余无学 不能著书 以勉国人，则但有多译西产英雄之外传，俾吾种亦去甚倦敝之习，追蹶于猛敌之后 老怀其以此少慰。”鼓励中国人要向西方学习，学习他们善于接受新思想，学习他们敢于冒险的勇猛精神，学习他们办实业。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昌盛。

他悲愤于清政府的无能，书评中一再批评政府不伸公理，不提倡正义 使人无心于国。他在《黑太子南征录 序》中说，日本人、英国人多能以身许国 前赴后继 而我国的当政者 事事遏抑 公理不伸 使人无心公战“荏弱之夫 不可语国也 悲夫！”1903年 他在《〈伊索寓言 按语〉》中说“不入公法之国，以强国之威凌之，何施不可？此眼前见象也。但以檀香山之事观之 华人之冤 黑无天日 美为文明之国 行之不以为忤，列强坐观不以为虐；彼殆以处禽兽者处华人耳，故无国度之惨 虽贤不录 虽富不耻 名曰‘贱种’ 践踏凌竟 公道不能消伸 其哀甚于九幽之狱 吾同胞犹梦梦焉 吾死不瞑目矣！”可以看出，他痛感中国国力荏弱，华人在外受侮，心情是十分悲痛的。他批评当政者不以国为国，才落得这种地步。作为一个书评家，他只能靠笔表达自己的感情。

在林纾感到一切都无望的时候，只能发出悲痛的呼号。他在《〈不如归 序〉》中痛说“非敢妄肆嗥吠 尚祈鉴我血诚”，他说自己不是像狗一样乱叫，只是希望国人能看到他的至诚。他还说“纾年已老 报国无日 故日为叫旦之鸡 冀吾同胞警醒”。这是一个老人的心声。他甘愿做叫出血泪的唤醒同胞

之鸡。

辛亥革命以后，他认为君主已无，立宪无望，失去了他心中国家的基础，使他很悲哀。1913年在《〈离恨天 译余剩语〉》中说：“西兵吹号伐鼓过余门外，自疑身沦异域”。身在天津，却听西洋兵的号角，他不禁十分悲怆。他对黄花岗之牺牲者，虽认为是英雄，但对新的政权是十分不满的，认为当权者只是为私利，为党争。他说：“死者已矣，生者尤当知国耻为何物，舍国仇而论私仇，泥政见而争党见，隳（音灰，毁坏之意）公益而求私益，国亡无日矣！”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在《残蝉曳声录 序》中说：“革命易而共和难，观吾书所记议院之斗暴刺击，人人思逞其才，又人人思牟其利，忽论事之当否，必坚持而强辩，用逐其私，故罗兰尼亚革命后之国势，转岌岌而不可恃。……则较之专制之不平，且更甚矣”。他希望“吾国民读之，用以为鉴。”林纾以此影射否定共和，认为共和并不比帝制好。共和者，不过是为私利，你争我夺而已。这里，他的根本错误是把辛亥革命当成私家之争、私党之争，否定其改朝换代的革命性质。

林纾从辛亥革命以后，思想就消沉了，虽然还不断翻译外国小说，但很少再写书评。1916年在《鹰梯小豪杰 序》中说：“余笃老无事，日以译著自娱。”这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他已不像1912年以前译书那样，充满热情。1913年以后，只不过把译书当作娱乐、消遣，当作谋生手段。“五四”运动以后，他的思想更加守旧。这是他的悲剧。

伍 杰

2005年5月18日

二、“西学第一者也” ——严复与书评

严复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我国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出色的翻译家。作为思想家和翻译家，严复早已名扬海内外，在国内知识阶层中更是尽人皆知。但是，作为图书评论家却几乎无人提及，当我们认真研究现代图书评论的时候，便会发现严复也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图书评论家。他的图书评论不仅政治性、思想性很强，也很有知识性，而且文字犀利。对当时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观念，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反对封建制度 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人 字又陵 又字 幾道。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1876 年被派赴英国留学，入格林尼治海军大学。1879 年 6 月回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1886 年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任总办（校长），执教二十余年。1897 年与夏曾佑等主办天津《国闻报》。1902 年到北京任京师大学堂附设编译书局总办。1904 年回上海 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 并任校长。1908 年在北京任学部（教育部）

审定名词馆总纂。1909 年被赐予文科进士。1910 年海军部特授协都统，次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中华民国成立后被聘为京师大学堂校长，不到一年便辞职。1913 年被聘为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1914 年任德法会议议员、参议院参政及宪法起草委员。1915 年被杨度列名鼓吹恢复帝制的“筹委会”发起人之一，因此名声一落千丈。1921 年 10 月病卒于福州故里。

严复的书评实践和书评观，是围绕他的政治观点、学术思想展现演绎的。他一生中有近 20 万字的书评文字。他长于书评实践，但没有系统的书评理论。在近 20 万言的书评中，大部分是以按语形式写出的，小部分是完整的书评文章。如影响最大的《天演论》的按语 29 条约 18000 字 最长的按语达 20000 字 千字以上插语有 4 条。《原富》（《计学》）的插语 300 多条 约 6 万多字。孟德斯鸠《法意》的插语 340 多条 约 7 万多字。穆勒《名学》的插语 37 条 约 8000 多字。《社会通论》的插语 15 条 约 4000 多字。仅以上 5 本书的插语就有约 16 万字。除了插语 还有《译 天演论 自序》、《译 天演论 例言》、《原富 译事例言》（一说《译斯氏 计学 例言》）《〈群己权界论（原名《〈自由论 译凡例》）》《〈群己权界论 译者序》、《译 群学肄言 序》、《〈群学肄言 译余赘语》、《读新译甄克斯社会通论 》、《〈社会通论 译者序》、《〈名学浅论 译者自序》、《〈民约 平议》、《译卫西琴 中国教育议 序》、《日本宪法义解 序》、《〈英文汉法 厄言》、《英华大字典 序》、《泰晤士 万国通史 序》、《〈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序》、《〈阳明先生集要三种 序》、《〈也是集 序》、《〈蒙养镜 序》、《〈涵芬楼古今文钞）序》、《〈老子 评语》、《〈庄子 评语》。最早的书评是对《天演论》的评议 写于 1896 年，最晚的书评是写于 1914 年的《平约 评议》和 1916 年的《〈庄子 评语》。以上是严复所写书评

的大致方面。本来“序”不一定是书评，但是严复在每部书的序言、例言中，都有对原书的评论，都有对原书的见解，这也应是书评了。此外，他还在许多文章、讲演中对一些图书进行了评论。所以，他是两个世纪之交当之无愧的很有贡献的图书评论家。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真正全面了解西方文化、思想的思想家，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全面系统地宣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启蒙思想家。他学养很深，见识很广，译书最多。他在英国留学期间，大量阅读了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逻辑学等各方面的名著，如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卢梭、孟德斯鸠的社会学等等。他深受这些著作的影响，接受了这些著作宣传的思想，深深认识到西方诸国的强大，在于有发达的自然科学，有进步的社会科学，有优于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他认为中国已经腐朽不堪，被各强国所凌辱，原因在于封建守旧，不接受新东西，“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中国必须破旧立新，奋起图强，唯一的办法是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政治、经济，“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他说：“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也。”“驱夷之论，既为天亡所废而不可行，则不容不通外国事。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羌尚因循，行将无及”。他对旧学并非一概否定，而是采取分析的方法，“存其是而去其非”。他对西学的科学态度十分赞赏：“此种学科，并无主张，只是公理，人人可自用其耳目，在得实验其不诬。”于是，他回国后大力翻译西方著作，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向中国读者宣传科学民主。应该说，他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潮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

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梁启超称他“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①；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②；是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这并不是夸大之说。

严复是著名的翻译家。他不仅讲究翻译的文采，更注重准确，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他的信、达、雅的翻译准则，至今仍为翻译界所遵循。他本人也是本着这样的原则翻译的。他1898年首译赫胥黎的《天演论》，1902年译亚当·斯密的《原富》，1903年译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1904年译甄克斯的《社会通论》，1904—1909年译孟德斯鸠的《法意》，1905年译约翰·穆勒的《名学》，1909年译那方斯的《名学浅说》被称为八大名著。这八大名著的出版对清末引进西方“学术思想、政治制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他还翻译了两部外国人论述中国问题的书籍：密克的《支那教案论》（1892年译）、卫西琴的《中国教育议》（1914年译）还译有《欧战缘起》（1915年）还编写了用汉文讲英文文法的《英文汉法》。有些著作的翻译年代说法不一，这里只取其一，对其他说法没有考证。比较早又最具代表性的是《天演论》。吴汝纶在序言中十分推崇：“抑汝纶之深有取于是书，则又以严子之雄于文，以为赫胥黎氏之旨趣，得严子乃益明。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此书刚出版就引起了思想界的巨大反响，梁启超、康有为都赞叹不已。使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一时风行全国，影响了一大批思想家。严复敢于把当时西方有代表性的著作都翻译到中国来，足见他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眼力、翻译水平很高、坚持“信达雅”的出色翻译家。

严复的图书评论范围比较广，包括评论古今中外的许多图书。所评的内容随他自己思想的变化而变化，观点也前后

不完全相同，侧重点也因思想变化而各异。他早期激进，后期保守，这也表现在对图书的评论上。早期主要评西方著作，晚期则评中国古代著作较多；早期通过评论提倡科学民主，晚期比较保守，有些评论也表现了他政治上保守的倾向。概括起来，是以评西学为主，以政治评论为主，评论以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为主。

严复写书评的目的是提倡西学，以匡中华。他认为旧学“不足恃”，中国自甲午一创于东邻，庚子再困于八国，海内愤然，始知旧学之不足恃，而人人以开论民智为不可以已；以旧有之经义词赋，议者以为无所用也，功利机巧兵商工虞之事，吾国失官久矣，是必求之于彼而后能”。这些见解是相当有见地的，由此，他才有“译书之说”。他还说：“复兮者勤羌译书，羌无所为，不过阅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发愿立誓，勉而为之。”他深感中国人对西方的“新理过于蒙昧”，也就是对西方的科学、民主、进步无知。而日本则早已从蒙昧中解放出来，所以进步很快。他想启迪人们的思想，开发“民智”，使中国人很快地了解西方，所以才发愤译书，认真评书。他深赞日本人的学习精神和他们对西学的态度：“彼日本非不深恶西洋也，而于西学，则痛心疾首，卧薪尝胆以求之。知非此不独无以制人，且将无以存国也。”他将西方与中国进行了比较，找出了中国的弊端，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降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走居而州处；中国人多忌讳，而西人话平。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廉屈，而西人多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为学也，中国读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封建的中国社会的差

异，所以，他才极力倡导西学。严复也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对西方著作进行评论的。他在《天演论》的序言中，反对有些头面人物骄傲自大，认为西学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西人追求的没有超出功效利益，严复认为这纯粹是主观武断，根本不考察实际“西学之事 向涂日多 然亦有一二巨子 弛然谓彼之所精，不外数象形下之末 彼之所务 不越功利之间 逞意为谈 不咨其实”批评了他们否定西学的态度。

在严复翻译的八大名著中，对其中五部进行了系统的评论 它们是《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社会通论》。其他三部 包括《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名学浅说》也都通过翻译例言、序言等形式作了评论。严复对这些著作的评论可以概括为几个部分：一是对原书的介绍、评价，平实客观地介绍原著的内容；二是对原著内容的诠释，这大都体现在插语中，对原著某段或某个论点作技术性的诠释；三是进行中西比较性的评论，将西方的某些成就、某些观点和中学比较，评议中西学的异同；四是西学间的相互比较，同类著作、同类学术流派的发展，某些思想观念的比较评议；五是对原著内容的评论，用自己的学养和独到的眼光，对原著论是说非，说长道短，肯定或否定。这部分分量重，内容多，这是他评论的主要部分，也是最能体现他对西学的认识、反映他的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六是联系中国实际发表感慨性评论，这部分内容极多 所占分量也大 这是他翻译和评论的重点和目的 充分体现了他要引进西学“西学中用”以匡中华的指导思想。

严复的书评特点之一，是从介绍原著的内容着笔。他翻译的八大名著 在当时的西方 也是很有代表性的 涉及了西方学术领域的几个重要方面。他的评论都是从介绍原著入手 对每部著作都是通过序言、凡例、翻译赘语、插语等形式简要介绍全书内容。如《天演论》是英国生物学家、哲学家赫胥

黎的重要著作，主要论点是同意达尔文的进化说，即物竞天择的理论，不仅用之解释自然界的演变，还用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严复完全同意这些论点：“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尔‘任天为治’之末流，指赫氏‘以人持天’补充了斯氏之论）。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说斯氏的“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黄天地人而一性之。此亦晚近之绝非也”。在《天演论·致十六·治辟》插语中说：“前篇皆以尚力为天行，尚德为人治。争且乱则天胜，安且治则人胜。”对《原富》在例言中说：“云《原富》者，所以察究财利之性情，贫富之因果，著国财所由出云尔。故《原富》者，计学之书，而非讲计学之正法也。”高度概括地评介了《原富》的内容。对《社会通论》则联系中国社会发展太慢而评介说：“民生有群，群必有治，是书所言，著治理之天衍，自其粗简，以至精繁，使因果相生，厘然可指，故曰史也。”此类书评仍属于介绍性的。《群学肄言》是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尔的著作，他评介说：“非群学也，言所以治群学之涂术而已。此书枢纽在《知难》一篇。其前三篇，第一《论愚》言治群之不可以无学，第二《倡学》明此学之必可以成科，凡学必有其因果公例，可以数往知来者，乃称科学，第三《喻术》则囊括本科大义……”；“学群者，将以明治乱”等等。他从介绍原著大旨、内容出发，进而引申发挥，比较客观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学术发展的基本概况和各派观点，其中包括社会学、逻辑学、经济学、哲学、伦理学等诸多方面。

严复的书评所以出色，在于联系中国实际，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他极力提倡言论自由。在对《群己权界论》的评论中说：“吾国考西政者日益众，于是自由之说常闻于士大夫。顾竺旧者既惊怖其言，目为洪水猛兽邪说；喜新者又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以二者之皆讥，……夫自由之识多矣，

非穆勒氏是篇所能尽也。虽然，学者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由之说乃可用耳。”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此刊《大学》挈矩之道，君子所以平天下者矣。穆勒此书，即为人分别何者必重自由，何者不可自由。”须知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性真事实，虽出仇敌，不可废也。使性虚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此之谓自由。”自由云者，乃自由由于为善，非自由由于为恶”。还说：“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配……而期刊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吾行之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他解释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中外很大的不同点，在于自由与不自由。中国需要真正的自由，不必害怕自由。

严复还通过评论，提倡经济上的开放，任其自由发展。他认为民富才能强国，根本在于民富，人民富裕了才有强盛的国家。这在对《原富》的评论中说得最为透彻：“夫所谓富强云者，贪而言之，不外民利云尔。”这是他利民、重利的一贯主张。他以英国为例，说斯密的理论为英国所接受，英国才得以富强。他指出：“观于斯密氏此言，则英伦平税之难行，每禁之难弛，于其对羌渺然绝无可望者。然自嘉道之际，英相万锡达当国之后，言商政者，大抵以自由大通为旨。至道光二十六年，而平税之政行矣。其去斯密氏成者之日，为时仅四十有五年而已。夫何必其国之为乌邦而后能哉，论者谓考英国计政之所以变，而国势之所以日臻富强者，虽曰群策，斯密氏此书之功为多。斯密氏的经济思想使英国富强，他认为这也符合中国的实际。严复举了自由贸易的例子：“自由贸易非他，尽其地利压力，二者出货之能，恣贾之公平为竞，以使物产于重麻配。”“盖国之财赋，必供诸民，而供诸民者，必其岁入之列，仰

事俯畜之有所余，而将弃之以为盖藏者也。是故君上之利，在使民岁进数均，而每物致用之权力日大”。严复赞同斯密氏反对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随意干预的观点，强调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作用：“设官斡之，强物情，就己意，执不平以为平，则大乱之道也。”供求相剂之理，非必占人所不知。其发之精凿如此，则斯密氏所独到。此所谓扩古之意也。羞当时格物之学，如夜方旦，斯密氏以所得于水学者通之理财，知物价趋经，犹小趋平，道在任其仍已而已。顾任物为变，则如纵众归大增，非得其平不止”。

严复在书评中极力提倡西方的民主政治，要保障个人自由，反对儒家空谈仁义。他提出：“故天演之道，不以浅夫昏子之利为利矣，亦不以谿刻滥施妄与者之义为义，以其无所利也。”他驳斥那些只是空讲利义，不讲效果的谬论：“此其用意至美，然而于化于道皆浅，几率天下祸仁义矣。”他说，西方的民主制度“义利合，民从善”，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也；宰相以下，皆由一国所推择，是官者，民之所谓以厘百工，而非徒以尊奉仰戴者也。抚我虐，皆非所论者矣。出赋以庀工，无异自营其田宅；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吾每闻英之人言英，法之人言法，以至各国之人言其所生之国土，闻其名字，皆我曾闻其父母之名，皆肫挚团结，羌有无穷之爱也者，此其故何哉？无他，私之以为己有而已矣。”政治民主、个人自由的结果，是培育出对祖国的爱，这是严复所以坚持民主自由的出发点。

严复在书评中还提倡功利主义的伦理观。十分难得的是，他提出了以天下之乐为己乐，以人之乐为己乐的观点，他说：“人度量相越，还所谓苦乐，至为不齐。故人或终身汲汲于封殖，或早夜遑遑于利济。当其得之，皆是自乐，此其一也。且天为人之土，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亦谓苦者吾身，而天下缘